

中國佛教大觀

任繼愈題



哈爾濱出版社

主編 黃卓越

A SURVEY OF CHINESE BUDDHISM

下

中国佛教大观

黄卓越 主编

(下)

哈尔滨出版社

1995·1

(黑)新登字 12 号

书 名 中国佛教大观
作 者 黄卓越等
选题策划 关 力 宋玉成
责任编辑 宋玉成
封面题字 任继愈
装帧设计 王 绘
责任校对 吴光正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新街副 291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1/32 印张 52.25 字数 1217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80557—731—5/B·21 定价 (上·下)68.80 元

第七编

寺塔建筑

（佛教的传播，是与大规模地建造寺塔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是出于一种宗教的目的，为供奉与膜拜而服务的，有些则是僧侣们用以居住的处所。）但是即便是在最初的佛教遗迹中，也包含了艺术创造的要素，佛教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巧，幻想的形式，来设计、制造出一座座有别于世俗样式的寺塔，在广阔的东方大地上树立了无数能体现其精神追求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就我国目前留存于各地的各类古代遗迹看，寺、塔等佛教建筑占的比例无疑是最多的。

就形式上看，佛教建筑经历了不断发展的历史。这反映在它们的布局、结构、装饰等诸方面。同时也与时代的氛围、特点，宗派的宗教理想、思想等有关。又几乎每一座寺、塔，每一片遗迹，都联系到一段真实的故事。在该编中，我们大体上将其分为名寺、名塔与名山三个部分，以期概括性地展现其建筑风格与历史的各个方面，使读者对之有个较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第一章 佛 寺

第一节 佛寺的渊源和历史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东汉三国时开始于宫廷贵族间传播。在此时期，与佛教信仰及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佛教建筑艺术，也由北印度传入西域，进而流行于内地。我国的佛教建筑虽渊源于印度，但佛教建筑在我国的发展正如同佛教的儒学化一样，其古印度原型逐渐汉化，在汉地发展为殿宇式建筑，并用了表示官署名称的“寺”字。

《汉书》注云：“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佛教传入中原，是由汉明帝派遣使臣前往西域，请来天竺僧摄摩腾等至洛阳而始。摄摩腾等初到时，被招待住于鸿胪寺。因其时鸿胪寺是掌宾客朝会礼仪的，其后将此寺改建，称白马寺。后世遂相沿以“寺”为佛教建筑的通称。于是，佛寺作为僧众供奉佛像和居住修行的处所，历来为佛教活动中心、偶像崇拜和弘法布道的堂奥。

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浮屠祠、招提、兰若、伽蓝、精舍、道场、禅林、梵刹、神庙、塔庙、庵、寺、庙等称谓。其名或源于梵文音译，如“浮屠”为梵语 Buddha 的音译，也译作“佛”，佛教刚传入时其建筑曾借用中国传统的“祠”的名称；或为假借、隐喻，如“梵刹”，梵表示清静，刹表示土地或地方，喻寺为清静之所在；或为某种类型的专称、别名，如“庵”，古代隐世修行者所

居的茅屋，称为“庵”，后来称比丘尼所居的佛寺为“尼姑庵”、“尼庵”；到明清时期通称为寺、庙。庙原为奉祀祖宗和前代贤哲的地方，后渐用以称奉祀神佛的地方。

我国佛寺的由来，途径不一。中国的佛教信徒，极少有如印度那样的迷狂者，他们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以世俗的目光来看待佛教，认为佛寺是佛“住”的，所以无非是住宅的放大和宫殿的缩小。因而，“舍宅为寺”之风盛极一时。如洛阳的建中寺，为普奉三年尚书令乐平王朱世隆所立，原为阉官司空刘腾之邸第。一部分佛寺由崇信的帝王建造，如简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造同泰寺；一部分佛寺由僧徒启乞而立，如瓦官寺。

（我国的汉地佛寺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发轫于汉代，风靡于六朝，继盛于隋唐，没落于明清。）

汉代，佛教被统治阶层视为类似黄老之学，并未受到重视，因而此期佛寺数量不多。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佛寺当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洛阳白马寺（《大清一统志》卷163，河南府二，寺观），其址建于洛阳城西雍关外，相传“时白马负经而来”（《洛阳伽蓝记》），遂取以为寺名。《魏书·释老志》云：“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由于后世该寺屡有兴废，原构实物不存。然白马寺历来被尊称为中国佛门之“祖庭”，梵教之“释源”。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抵洛阳，游庐山，建太安寺于豫章（今南昌），是为江南佛寺之滥觞。此后梵宫琳宇遍布江东。

随着统治阶层的提倡，两晋时，许多僧徒成为权势者，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越前代。西晋时西域沙门佛图澄于永嘉四年（310年）至洛阳，云游所至，广建佛寺893所。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般若台，居中作须弥

山，四面有崇石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东晋时的帝室、朝贵、名僧及一般士人，很多都醉心于佛寺建筑，历史上著名的东林、瓦官、长干诸寺均筑修于此时期。

南朝以金陵及庐山为中心，各代帝室所造寺塔极多。据《辩证录·释氏通鉴》记载，佛寺之数在西晋有180所，东晋有1760所，宋有1913所，齐有2015所，梁有2846所，陈有1232所。这些寺塔宏壮雕丽，凌云七、九级，宛若天宫。特别是梁武帝（502～549年）建造的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伾魏永宁。”（《历代三宝记》卷11）

北方造寺以洛阳为中心。北魏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佛寺的建置陡然大增，“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洛阳伽蓝记·序》）在北魏统治范围内，正光（520～524年）以后有佛寺3万余所，而其首都洛阳就有1367所。《洛阳伽蓝记》形容斯时寺塔之盛况：“昭提栴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锦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佛寺的普兴，由城市及其近郊而逐渐弥散于远离城郊的山野地带。除平地建寺之外，魏晋南北朝还大兴凿窟造像之风，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都于此期开始营建。当时主要的寺、塔和石窟多数由国家主持修建，糜费人力财力甚巨，当时就有建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肖子显《南齐书》卷53，虞愿传）的记载。

隋唐时，佛教空前发达，佛寺林立，香火旺盛，各宗各派，相继成立，并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隋朝佛教的兴盛与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是分不开的。隋文帝在开皇元年于五岳各置佛寺，把固有的山神崇拜与佛教结合起来，又下诏令复兴天下佛寺均名大兴

国寺。隋代的佛寺建筑，以文帝所造的大兴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的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閤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18）

唐代的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的目的，采取儒、道、释三教并尊的政策。唐代的20个皇帝，除武宗外都倡提佛教，因之佛寺遍布全国。唐代都城长安，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佛教各宗并盛的重地。四方佛徒跋山涉水来此译经弘教，一时僧尼溢于三辅，寺塔遍于京城，曾有8个宗派在长安的6座寺院分别创立：三论宗、成实宗的祖庭草堂寺，法相宗、俱舍宗的祖庭大慈恩寺，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律宗的祖庭大净业寺，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净土宗的祖庭香积寺。祖庭即祖师的庭院，他们所开创或住过的寺院。祖庭是中国佛教宗派的端始发源之地。此外，据《长安志》和《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的记载，唐长安城内的寺观共有195所，可考的著名寺院不下三、四十处。其中一部分为隋代的旧有，大部分为唐代兴建的，一部分为皇室、官僚、贵戚舍宅改建的。鼎盛至极的佛寺建筑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法”时，一次被拆毁44600所。几经浩难，唐代佛寺除去个别殿宇外，没有成群成组地保留至今日的。建筑于唐的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幸存的我国最古的佛寺。南禅寺正殿大佛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殿身面宽与进深均三间，略呈正方形，单檐歇山顶，是研究唐代建筑发展史的重要实物。佛光寺建筑甚具浓厚唐风，此寺的正殿虽比南禅寺正殿晚75年，但其规模较大，且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

佛教发展到宋代，内部各宗派开始融汇，相互吸收而复合变

异。天台、华严、律宗等唐代盛行的各宗派已日趋衰落，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主导的宗派。随着禅宗的汉化，大约在南宋时禅宗寺院已相应确立了“伽蓝七堂”的制度，完全成为中国传统的一正两厢的多进院落的格局。“七堂”指寺院的主要建筑，即凡是寺院必须具备七座不同功用的殿堂，否则不能称伽蓝（寺院）。由于禅宗寺院的配置最具章法，所以其他各宗派亦步亦趋，佛寺建筑到宋代已完全汉化。也许是继五代十国的纷乱局势之后，羸弱的北宋与辽，半壁的南宋与金、元的对峙局面所致，宋代的寺庙建筑组群或单体建筑都失去了唐朝的大气魄和宏伟刚健的风格。然而，由于宋代手工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然地促进了建筑材料的多样化，创造了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并直接增加了宋、辽、金、元的建筑艺术效果。但存留至今的实例仅止一处，即创建于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大事扩建的河北正定县的隆兴寺。隆兴寺现尚存山门、摩尼殿、慈氏阁和转轮藏四座宋代建筑。寺院经元、明、清历代重修，较完整地保存了宋代的佛寺建筑总体布局。

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寺观建筑逐年有所增置，佛寺尤多。永乐年间撰修的《顺天府志》登录了佛寺 111 所，到成化年间，京城内外仅敕建的寺、观已达 636 所。《宛署杂记》记述了当时翻修古刹、新建寺宇的情状：“见其旧有存者，其殿塔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又见其新有作者，其所集工匠、夫役，歌而子来，运斤而去，行纍而织，如潭柘寺经年勿亟，香山寺、弘光寺数区并兴。”此期，制砖的生产迅速提高，我国佛寺建筑出现了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因内部没有梁架，故通称为“无梁殿”。如南京灵谷寺内的无量殿，殿内结构用砖券代替木梁。正面五开间，每间一

券，每排五券。中央一间券洞最大，横跨 11 米余，高 14 米。内部虽为券洞，外部仍仿木结构形式，檐下有挑出的斗拱，立面还建有门窗，为一采用多样券法、错综连合构成的建筑。

清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处于式微阶段。佛教以禅宗和净土宗为首的各宗，在民间的流传已失却宋、明时期的势头，但由于政府的倡导，新建、扩建寺院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其中不少是由皇家敕建的。此时的佛寺建筑日趋琐杂，从斗拱的变化可见一斑。斗拱用材由大变小，数量由少变多，作用由原来的结构而变为装饰，显得精细奇巧，落入俗套。佛寺建筑形象的丰富、绚丽、繁缛和保守，恰正显示出其对历代形象信息的积淀和重组。

约自元代起，我国喇嘛教日益兴盛，喇嘛教寺庙，尤其是黄教寺庙的建筑，在明清达到高峰。到清代中叶，黄教在藏族地区已有寺院约 4000 所，喇嘛达 36 万人之多；内蒙古有寺院约 1000 所，喇嘛达 10 万余众。元代佛教建筑因受喇嘛教影响，多塔而少寺。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即属此期此类的建筑范式。蒙古族从明代起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到清代得到更密切的融合。这种情况反映到佛教建筑上是城市中的寺院完全采用了汉族传统佛寺的布局方式，除大经堂的平面、空间处理仍然保持喇嘛教的特有形式之外，其他建筑都与汉族佛教建筑大略相仿。呼和浩特市의席力图召即是这一文化交汇现象的典范，其主要建筑按传统的纵轴线排列，但在中轴线的后部，布置了独具喇嘛教寺院特色的大经堂。

为了团结、笼络蒙族和藏族的上层人士，清代在全国各地广泛兴建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喇嘛教寺院。如西藏的哲蚌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都是著名的大寺院。拉萨的布达拉宫建于清顺治二年（1645 年），它利用山峰缘山修筑，高达 200 余米，外观 13 层，主体建筑红宫和白宫则高耸于山顶，与山峰连为一体，

创造出雄伟独特的建筑造型。河北承德的外八庙建筑，是清朝皇帝为抵御沙俄侵略者，便于联系和团结蒙、藏等民族而兴建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其建筑形式与藏传佛教地区的佛寺建筑不尽相同，它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形。

在西藏的寺庙里，有着极为丰富而生动的佛祖和菩萨的壁画和塑像。如释迦牟尼、观音娘娘、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及其他显密两宗的佛像。特别是喇嘛教特有的密宗造像，金刚怒目，狰狞可怖，以骷髅为其装饰，持头盔作饮器，真是造型奇特，却也令人感到重重森森的恐怖氛围。这一现象与印度寺院相当相似，从中反映出我国汉地佛寺已脱胎于其母体，焕发着中国建筑、中国风情的光彩。

第二节 佛寺的沿革和形制

中国佛寺建筑的发展历程，与所有外来事物都同样走过的吸收、融合、创新等诸阶梯路途一样，在不断摸索中寻找自己独树的韵味，更新自己的影像，塑画为一幅幅具有本民族风情的人文景观。

东汉至东晋年间，佛教传入不久，属于这一时期的佛寺遗址尚未发现。据《魏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东汉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后汉书》卷103，陶谦传）。这说明最初的佛

寺是以塔为中心，四周用堂、阁围成方形的庭院。印度佛寺的平面布局即是如此。因塔藏舍利（佛的遗骨），是佛教徒崇拜的对象，所以塔位于寺的中央位置，成为寺的主体。然白马寺的布局是由官署布局改建而成，因此其形式属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可见，印度式的寺塔形制从传入中国伊始，就已在开始更改着自己的形象。

南北朝时，佛寺的布局多以主塔为中心，采用附属建筑来烘托主体的艺术处理。此类为汉代旧型的延续，以北魏洛阳的永宁寺为代表。永宁寺采取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格局，前有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塔仍为全寺主体。寺有台阶、屋顶、斗拱、勾栏，吸收了汉地房屋建筑的许多规制。中国传统礼教中有以台基高低定尊卑贵贱的，汉代台榭建筑层楼重叠，飞檐翘角，同神仙方术结合含有尊崇天神之意，这种传统礼制建筑深深影响并融合于佛寺建筑之中。

北魏中晚期通过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的宫室、宅第改建为佛寺，往往“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洛阳伽蓝记》卷1建中寺）这些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形式融合到佛寺建筑中，使佛寺内有了许多楼阁和花木，形成与前期迥然不同的风格，成为以后佛寺建筑的主流；佛寺的平面布局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多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大多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的均衡对称方式，主要佛殿都布于主轴线上，再以主要建筑的两侧和对面布置若干座次要建筑，组成封闭性的院落。这已完全不是印度的旧观，而是中国均衡对称的排列配置方法。

隋唐佛寺承继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同样以殿堂门廊等组成以庭院为单元的组群方式，井然有序，分区明确。这时，供奉佛像的佛殿已成为寺院的主体。有的在寺旁建塔，另

成塔院，这与印度佛寺以塔为中心的做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类佛寺一般都有明显的纵中轴线，即从主要入口“三门”（也作“山门”）开始，沿轴线纵列数重楼阁，中间连以横廊，划分成几进院落，构成全寺的主体部分。佛寺中较大的寺院分布在主殿两侧，成廊院式布局，即对称排列若干较小的“院”。据《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载，大寺可多至十数院，且以二、三层楼阁为全寺的中心。主院和各小院之间均绕以回廊，连接小殿、东西殿、讲堂和钟楼等，廊内有壁画。塔的位置由全寺的中心演变为殿前左右置双塔或于主殿庭前两侧分立塔院。此外，寺中还有供僧众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大型佛寺有磨坊、菜园等，有的还附设宾客馆。

北宋和辽代的一些大型佛寺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格局分布。如开封的大相国寺的主体：前为三门，门内有一至数重佛殿，后为阁，前方东西侧各有塔，主殿两侧各有若干个院。宋时，“庙会”成为寺院招揽香客的一种形式。由于与四合院建筑的结合、融化，中国的寺院具有了人的生活气息，比印度寺院阴森恐怖的气氛更能吸引民众，并逐步发展成为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载：大相国寺庙会有衣食器用、图书文玩、星相医卜、飞禽走兽等集市。庙会只是利用殿庭和廊庑临时设摊，并不影响佛寺的建筑布局。

宋代禅宗兴盛，禅宗佛寺布局有“伽蓝七堂”之说，具体内容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指作为一所佛寺必须具备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厨库、浴室、西净（厕所）等七座殿堂。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整体布局的一个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楼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已毁。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方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和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

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等所构成的形式瑰伟的空间组合。最后弥勒殿位于寺后。佛香阁和弥勒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自外而内，殿宇重叠，院落互变，高低错落，主次分明。这种以高阁为全寺中心的布局方法，反映了唐末到北宋期间高型佛寺建筑的特点。

明代以后佛寺布局又有所变化，主体建筑有山门，门内左右有钟楼鼓楼，原三门处改为天王殿，内为大雄宝殿、东西配殿，后为藏经阁。自天王殿至藏经阁，以廊庑、配殿围成殿庭，与唐宋用回廊者不同。大型佛寺两侧仍有小院，最后部分并列为三个院：中央为大悲阁，左右为方丈院。现存山西太原崇善寺的布局即是此类典型形式之一。如果拿唐朝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的律宗寺院和它比较，不难看出其变异，如廊院制度、主院与小院间以夹道联系、东西部小院与主体廊院的关系等。北宋以来，大寺中多供罗汉。开封的大相国寺曾塑五百罗汉，供于三门的上层。明以后发展为田字形平面的罗汉堂，多在寺侧另辟一院，不影响全寺的整体布局。典型者为北京香山的碧云寺内的罗汉堂建筑。

从元代起出现了佛寺的新类型，它的兴建同喇嘛教传入内地有关。喇嘛教寺庙一般都有二至六个“扎仓”（经学院），供僧众念经修习，内供奉着不同的佛像。各个扎仓都是大型经堂建筑，经堂空旷高大，可容数千喇嘛念经。扎仓以外，寺内设有专为供奉各种佛像的“拉康”（佛殿）。佛殿高而进深小，内供铜佛。旁殿置活佛尸塔，塔建寺内。藏传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和殿堂建筑，在7世纪已基本定型。个体寺院基本上吸取内地汉族佛寺的平面布局形式，具有院落式的特点，但没有明显的中轴线。它是以主要建筑扎仓和拉康为中心，其他建筑都是围绕着中心建筑而形成的一组组建筑，如各级活佛“囊谦”（公署）、辩经坛、印经院、“嘛

呢噶拉”殿或廊、塔以及大量的喇嘛住宅。这些建筑遍布山麓，沿等高线层层向上修建，将处于高处的主体建筑殿堂等衬托出来，使建筑群统一而又富于节奏感。如拉萨的布达拉宫、噶丹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四川的甘孜寺等。在平地上大致由中心向四周自由发展，以成组低矮的建筑群作衬托，以高大的体量和富丽的色彩装饰，突出主体建筑。如山南的桑鸢寺，拉孜的萨迦南寺，拉萨的大昭寺等。

喇嘛教特别注重修法仪轨。修法、受戒、驱妖时要筑曼荼罗。曼荼罗即法坛，又名坛城、闍城，基本上是十字轴线对称、方圆相间、“井”字分隔的空间。在井字分隔而成的九个空间或相间隔的五个空间里，按各种曼荼罗的要求布置佛菩萨，再现佛经中描述的世界构成形貌。曼荼罗运用到建筑上，有的成为寺院的总体布局的构造，如西藏的桑鸢寺，有的成为佛殿的造型式样，如北京雍和宫的法轮殿。

第三节 佛寺的殿堂配置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大致地说，殿是供奉佛像以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自古以来，寺院就有许多院落，这是舍宅为寺之风导致的，其中房舍称堂或者寮。宋崇宁二年（1103年），孔子庙被称为大成殿，从此寺院建筑除称堂或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亦称殿。其名称，或按其所供奉的主要神佛而定，有大雄宝殿、天王殿、毗卢殿、药师殿、弥勒殿、观音殿、韦驮殿、金刚殿、伽蓝殿等；或按其用途而定，有舍利殿、藏经殿、转轮藏殿、戒坛殿等。

唐宋时，佛寺必须有“七堂伽蓝”，否则不能称为佛寺。伽蓝七堂是佛寺平面布局的一种制度，该制度起源于印度，传入汉地后稍有变化。伽蓝七堂非佛教的一宗一派所独有，随着宗教礼仪、教义的不同而各异。禅宗的殿堂配置最具章法，比较固定，故各寺多从之。发展到近代，逐渐以佛殿为其主体突出部分，而且规范化。

我国建筑的营造法则，一般是把主要建筑安置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摆放于东西两侧。中国建筑将轴线理解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寺院的配置也遵此法。轴在佛教中认为是生命无休止地轮回的极轴，它上接天堂，下达地狱，象征宇宙的秩序。由南往北，佛寺主体建筑大致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这些建筑均为坐北朝南的正殿。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按照典型的佛教观点，空间上的中心位置是最重要和最具神圣色彩的场所，北和阴、南和阳相关联，所以所有的建筑都沿南北轴线排列。当轴心线两边有重要建置时，它们必须在位置、大小、排列上相互平衡。因此，作为中国建筑基础的有关神圣空间的观念就被同心、南北轴心、东西对称这三条原则所控制。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常常集中于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房、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职事堂（库房）、茶堂（接持室）等。中轴线西侧，一般为接待区，如设云水堂（禅堂），以容四海之来者。但有的寺院因经费、土地等限约，也有所灵活。

佛寺发展到近代，基本部分分为两组较固定的建筑：山门和天王殿为一组，合称“前殿”，前殿包括山门（山门殿）、钟楼、鼓楼、天王殿这一组设施；大雄宝殿为一组，包括法堂、伽蓝殿、祖师殿、藏经阁等设施，此部分为主体建筑。凡有此两大类建筑的佛教建筑方可称“寺”。